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

■ 曾毅 顾宝昌 郭志刚 等著

低生育水平下的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低生育水平下的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 曾毅 顾宝昌 郭志刚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曾毅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978-7-301-16383-2

I. 低… II. 曾… III. 人口-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C924.24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199号

书 名: 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著作责任者: 曾毅 顾宝昌 郭志刚 等著

责任编辑: 郝小楠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83-2/F·23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232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

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2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4年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余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六位增加到现在的近三十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十余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做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

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4年开始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丛书。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人士汇报中心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此系列第1辑共13本著作已于2004年出版,此次出版的第2辑将会收录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最新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以飨读者。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十余年只是一瞬;就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7年7月

引 言

在北京大学马寅初老校长科学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优良传统熏陶下,继2005年12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办“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之后,由CCER扩建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时俱进,于2008年12月20日在相同的会议地点朗润园万众楼成功举办了“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这两次论坛有三个共同特点。第一,集中讨论21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第二,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共聚一堂,进行跨学科的学术探讨;第三,学者们和政府官员们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深入切磋交流。

与2005论坛相比,我们的2008论坛又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其一,本次论坛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之间的探讨进一步扩大,邀请到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参会并发言,共同探讨人口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其二,如下面将要概述的,本次论坛对人口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讨论的范围更加集中,聚焦于若干尚有较大争议的、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与2005论坛后出版的专著只有一篇论文直接探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相比,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本次论坛的专著有五篇论文和二篇评论直接讨论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其三,与2005论坛基本上是学者和官员关起门来探讨、只允许极少数媒体有限的报道相比,本次论坛的社会开放程度和新闻媒体负责任报道的范围大大扩大。这正是我国政府在人口“敏感”问题上尊重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和透明开放重大进步的标志。

下面将本次论坛以及由此催生的奉献给读者们的这本专著四部分的主题、讨论的具体问题及其背景概述如下:

第一部分 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及其成因机制

讨论问题:我国当前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其成因机制是什么?今后变动和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背景:大多数相关人口学者基于所有生育数据与各种经典与前沿方法的研究都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在平均每对夫妇1.6—1.8个孩子之间。也有学者(比如郭志刚,2004)认为真实生育率很有可能比1.6还要低。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然而,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真实总和生育率显著高于1.9,甚至超过2.0。有的认为宁可相信高一点的估计数,并认为,政策稍有放宽,生育率即会大幅反弹。

第二部分 宏观和微观人口经济背景

讨论问题: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快速老化是否将形成危机?是否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将对我国国际竞争力带来什么影响?从家庭微观层次上来看,我国现行生育政策造就的大约一亿两千万独生子女是否属于问题儿童?现行生育政策对独生子女教育与发展的有什么影响?

背景:由于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以及寿命不断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迅速大增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同时,另一种观点认为,优势不在劳动力人数多,而在劳动力质量。老年劳动力经验丰富,人口老化还将引起人们对未来老年人口保障的重视而增加储蓄动机,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负面影响下一代成长,包括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微观环境得到显著改

善。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独生子女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完全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必然产物,而且与二孩或多孩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用于培养孩子的资源更丰富,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第三部分 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

讨论问题:在当前和未来的低生育率新形势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关系的辩证关系是什么?我国人口增长和粮食、土地利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六十至八十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经历快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使许多学者对于当时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负向关系提出质疑。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沿海五省市在人均自然资源十分紧缺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下,由于采纳充分利用丰富劳力资源在出口市场和扩大内需中的比较优势等正确发展战略与政策,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并随之带来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多分母大,必然负面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由于过去40年生育率大幅下降对我国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减轻了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必须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以保持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人口承载力与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研究综述表明,人口承载力的高低与生活标准、科学技术发展、投资水平、贸易体制、环境资源等众多因素相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开发保护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过分夸大人口的作用是不科学的。然而,另一种流行的看法是一谈到资源环境,马上以人口多作为最主要负面因素,因此,认为继续执行现行生育政策是资源环境保护的不可动摇的国策。

第四部分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

讨论问题: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负面或正面影响?如果对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放宽为普遍允

许生育两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

背景:一种观点认为应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平稳放宽为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做,于国于民、于长远于当前都有利,而且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允许生两个,群众(尤其是农民)就会生三个甚至四个,将造成人口失控。因此,生育政策不能放宽,如实在要放宽,也只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最多至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两孩。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论坛得到了学界同仁与政府官员们的广泛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据会务组签到簿的不完全统计,这次研讨会会有经济、人口、社会、健康、资源环境等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研究生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共计 123 人与会,其中学者 92 人、政府官员 20 人、媒体 10 家,包括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彭珏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教授,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谢义亚局长,国务院研究室郭玮司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岳颂东副部长,国家人口计生委郝林娜司长、赵延配副司长、郭振威副司长,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赵宝华,中华人口福利基金会苗霞秘书长等。

特别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本次会议的发言人与评论人与其他与会的学者及官员们在一天的会议中畅所欲言,围绕上面概述的人口与经济的重要议题,展开了十分认真、热烈的讨论交流。发言人与评论人在会后又对他们会前准备的论文及评论文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甚至重写,致使各章题目与论坛议程的论文题目及排列顺序都有较大不同。各章作者在各章第一页的脚注中标明;各章文稿分别由我们三人进行专业编辑,必要时返回作者进一步修改,最后由曾毅统稿。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四个专题共十三章与四篇特邀评论,以及根据会议专业人员速记整理的四个专题自由讨论主要内容。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与会的学者同仁与政府官员以及因各种原因未能与会,但帮助关注此次论坛的同仁们对我们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我们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对这次论坛在人力和财力

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对周其仁院长、卢锋副院长从筹划到具体组织各个阶段的指导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们衷心感谢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和家庭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柳玉芝、邢惠清、陈曦、高娟、李发菊、蒋承、曾宪新、陈华帅、沈可、陈国栋、程令国等老师与研究生们在此次会议的组织安排,会后对文稿、图表、参考文献格式的规范整理等方面的辛勤工作。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林君秀主任和郝小楠编辑的杰出编辑工作和大力支持。

我们衷心希望有志于第一人口大国低生育水平下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前瞻性研究的学界同仁们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与我们一起,继续齐心协力,勇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为国家科学决策,应对21世纪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面临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曾毅,顾宝昌,郭志刚

2009年秋于燕园

目录

第一部分 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及其成因机制

第一章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 3

第二章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

——国际的经验和江浙的比较 \ 15

特邀评论 低生育水平下对人口政策的反思 \ 26

第二部分 宏观和微观人口经济背景

第三章 我国人口—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与生育控制政策 \ 33

第四章 未来的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 48

第五章 人口老龄化、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 \ 61

第六章 现行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 \ 74

特邀评论 生育政策、劳动就业、人口老化和经济发展 \ 90

第三部分 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

第七章 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回顾 \ 99

第八章 从土地利用变化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土地人口承载力 \ 134

特邀评论 世界人口的第二次转变与新马尔萨斯论的破产 \ 142

第四部分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

第九章 七年之旅

——中国生育政策研究(2001—2008) \ 151

第十章	不应以沉重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	
	——从人文科学眼光看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161
第十一章	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政策	
	——从纽约的复苏想到的	175
第十二章	关于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看法	179
第十三章	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	191
特邀评论	吸取“滞后”的历史教训,从长远考虑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	220
	结束语	224
附录一	“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代表名单	226
附录二	与本次论坛相关的部分新闻报道	229

第一部分 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 及其成因机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 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①

一、中国低生育水平研究中的问题

现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已经普遍使用“低生育水平”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是指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low fertility, 或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因而它是指一个很大的总和生育率区间($TFR < 2.1$),然而人们所说的中国低生育水平具体所指的生育率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人口发展状况将是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而不同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极为不同的人口后果,因此,有必要将笼统的低生育水平划分为更细口径,从而有助于推进研究与学术交流。

国际上已经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等于或低于 1.3 的 TFR 水平(Kohler, Bilarri and Ortega, 2002)。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低于 1.5 的 TFR 水平(Caldwell and Schindlmayr, 2003)。这两种口径只是约定俗成,并没有像更替水平那样的人口统计学意义。本文将沿用这两种划分口径来讨论中国的低生育水平。

根据全国人口调查统计的结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现在这已成为人口学界共识,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② 但是,在真实生育

^① 本章由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撰写。

^② 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率水平的估计上则存在着很大差异和争议。

从实际调查结果的统计来看,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这种结果在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中都大体一致。但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由于这一生育水平太低,并且许多迹象都可以证明的确存在一定出生漏报,因此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调查数字。

然而,总和生育率作为时期生育水平的概要指标无论是对研究还是决策都太重要了,而我们又不知道实际生育率到底有多高。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研究、工作和宣传的需要就催生了多种生育率估计。绝大多数生育率估计都建立在认为调查统计存在大幅度漏报的基本认识上,因而在估计中都相应大幅度地调高了生育率。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工作规划和宣传中,则一直沿用生育率为1.8的口径,这种状态至今已经延续了十几年(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人口调查直接得出的TFR统计值要大大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外宣传的生育水平。要是依据直接调查的TFR结果,则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是“很低”甚至“极低”生育率了。并且,调查结果所揭示的前期生育率下降趋势是在向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平均生育水平1.47(郭志刚等,2003)接近,而后来又多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下。要是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所说的1.8的TFR水平,则也是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的,但距离“很低”生育率还差很多。根据教育部小学入学人数所作的高方案TFR估计(翟振武、陈卫,2007)相对接近于1.8,主要是因为这个方案从1996年以后的TFR几乎没有下降;而根据同一数据的中方案估计则反映出1996年以后TFR有所下降。

于是图1展现出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一种困境,即人口调查统计结果与人口规划与宣传所用的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并且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人口学者有责任指出这个问题,让其他学者、公众和政府知道这种状况。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如此情况我们如何来把握当前的生育水平。

实际上,多年来各次调查反映的生育率水平相对比较一致,并且这些生育率与调查中的其他指标如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少儿人口中的独生子